

编辑说明

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王东京同志自担任主任以来，结合其近二十年党校教学经验，围绕党校教学布局、讲课纪律、授课艺术等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看法和建议。这些看法和建议，紧扣党校教育培训工作实际，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和针对性。

为帮助我校教师进一步增强对党校教学特点和干部培训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断提高授课质量和水平，我们专门将《学习时报·党校教育专刊》中王东京同志关于教学工作的有关文章摘编出来，合订成册，供同志们参考和使用。

目 录

| | |
|--------------------|----|
| 一、说“一流学府” | 1 |
| 二、关于党校教学新布局..... | 4 |
| 三、也说“以教学为中心” | 7 |
| 四、党校讲课“三戒” | 10 |
| 五、党校讲课为何要有纪律..... | 13 |
| 六、说“名师” | 16 |
| 七、谈学术功底..... | 19 |
| 八、论学术框架..... | 22 |
| 九、向经典学什么..... | 25 |
| 十、关于“讲课艺术” | 28 |
| 十一、我看“研究式教学” | 31 |
| 十二、关于“研究式”考试..... | 34 |
| 十三、论“末位调整” | 37 |

说“一流学府”

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打算讨论什么是“一流学府”，习近平校长已讲得够明白，再多说是画蛇添足。这里要说的，是中央党校如何建设“一流学府”。在党校任教十数年，现在改做教学管理，身在其中而耳闻目睹，多少有些发言权。正好，校委有意集思广益，本人也有些想法，不过是一己之见，不见得对，我姑妄言之，大家就姑妄听之吧。

首先一点要确定，中央党校究竟是不是学府？我的回答，当然是。中央党校若不是学府，也就谈不上建设“一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谓学府，我理解，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要有较为完备的学科设置，而且整个运转要以教学为中心。放眼看，不论中国外国，请问有谁见过没有学科设置的学府呢？是的，这正是学府与普通培训机构的区别。培训机构虽也以教学为中心，但却没有学科分类，没有专业师资；而中央党校不同，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科社、政法、党史、党建、文史、国际战略等学科，而且师资阵容强大。这样看，中央党校是学府是无可置疑的。

事实上，中央党校不仅是学府，而且是党的最高学府。这里说的最高，是指政治地位最高。众所周知，党校是一个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办有党校，而中央党校处在这个系统的最高端，故称最高学府。但应清醒的是，最高学府未必就是“一流学府”。说过了，学府要依托学科方为学府，而“一流学府”，就得靠一流的学科来支撑。否则没有一流的学科，建设“一流学府”是空中建塔，无根基，何谈一流？所以建设“一流学府”，我认为重点应放在学科建设上。

远的不说，让我们看看国内的几所著名高校。某高校之所以出名，无一例外，背后必有她相对强势的学科。比如北大，她的理科就在全中国首屈一指；清华，工科则独占鳌头；而人大的经济、法律也赫赫有名。相比之下，中央党校的强势学科是什么？不知大家怎么看，扪心自问，我却拿不准。也许有人说，中央党校不是以讲授“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见长么？不错，这的确是中央党校的优势，但可惜，这种优势尚未转化成学科优势。应该承认，与一流高校比，我们的学科还不够强，作为党校人，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差距。

我这样说，并非要妄自菲薄，也绝非说党校在各方面皆技不如人。中央党校的教员政治素质强，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学术素养与敬业精神，多年来学员也有口皆碑。前年我在党校中青二班做过一年的学员，听过很多教员的课，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一般高校教员肯定不能比；而论讲课艺术，整体水准也绝不低。可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党校有这么强的一支队伍，却为何未打造出强势的学科？这段时间我反复琢磨，想来想去，我认为原因有主客观两方面。

先从客观方面看，中央党校是党中央办的学校，背靠中央，面向高中级干部，因此教学必须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在这点上，党校是明显地不同于高校，高校侧重学历教育，而党校侧重干部教育；高校是按专业招生，且按专业系统开课；而党校是组织调训，由于学员需求不同，故只能采取专题式教学。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党校讲的是专题，可专题往往变化快，跨度大，一个教员承担的讲题，上下两个学期可能完全不挨边，这样教员总打“游击”，难以进行学术积累，当然就很难成某领域的专家了。

举我自己的例子。粗略算，进党校任教十八年，迄今讲题至少已在 30 个以上，并且这些讲题涵盖财政、金融、产业、国企、三农、区域经济、国际贸易、西方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打一枪换个地方，不停地变，久而久之，自己就成了万金油。说起来，似乎无所不能讲，可就是哪个问题也讲不透。当年的同窗学友不少在高校教书，如今有人成了财政专家；有人成了金融专家，可当有人问我的研究方向，我却无言以对。何以如此？我想是党校教学的特殊性，让教员很难固守某个研究领域。

不过这只是问题一方面，若换个角度即从主观方面看，党校的讲题设计是否可以照应学科呢？是的，党校教学要跟着热点走，这样做没有错。但想深一层，研究热点与学科建设其实不矛盾，可并行不悖。

这里的关键，是教员要有专业分工。比如经济学部的教员，就可分政治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区域经济等不同方向，而且一旦确定就要相对稳定，改打游击战为打阵地战。如此坚持三、五年，日积月累，教员必有自己的学术专长，而有了专家，学科建设必大有看头。

请别误会，我主张让教员打阵地战，并非要否定目前的教学模式。党校必须讲专题，而且不能变，要改变的只是具体讲题的设计。比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设的讲题就可按政治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区域经济等不同方向来拟定，这样定讲题，既可以发挥每个教员的专长，又有利于把问题讲透彻。现在的问题是讲题设计太泛，大而化之，无论教员研究哪个方向都难以把握。力不从心，课当然讲不好。专家出不来，党校学科也就难有大的作为。

我不懂其他学科，经济学如此，其他学科我想也一样。至少有一点可肯定，一流的学科，必须有一流的专家。而经验证明，培养专家是要有学术分工的。当今时代知识爆炸，不可能指望每个教员都成为通才。尽管党校更需要“大家”，教员最好贯通文、史、哲、经。但“大家”得首先是某领域的专家，先专而后博；不然博而不专，充其量是个杂家而已。近些年，党校专家出得不多，原因复杂，但我们的讲题设计是否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最后再说一遍，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敢说完全对。若如有不妥，大家尽可批评。我作此文目的原本就在抛砖引玉，要是能引发各位同仁的思考，则于愿足矣！

关于党校教学新布局

写下这个标题，总想着读者会不会认为此文是老生常谈？近来左思右想，可还是想不出更好的题目。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备选，只是觉得其他皆不够贴切。据自己多年写文章的经验，拟题要以达意为先，既然没有更优的替代，就不妨用这个题，来个旧题新作吧。

是的，今天党校“一个中心（学习中特理论）、四个方面（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修养）”的教学布局，说她“新”，其实也并不新，因为少说已经运行了十年。只不过与从前“老五门”比，目前的布局算是新的。另外一层，虽然党校人对教学布局的变化身临其境，但对为何要坚持这个布局，相信不少人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尤其那些不从事干教的局外人，怕更是难明就里。由此看，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新布局”并非多此一举。兹事体大，事关党校教育定位，说说清楚是必要的。

记得早在十年前，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先生讲，党校所以要坚持“一个中心，四个方面”的教学新布局，理由是现在的高中级干部不少是文革后的大学生，又多为理工科背景，学马列不系统；而中央党校要培养治党治国的政治家，而政治家必须具备世界眼光、战略思维与党性修养。这是说，中央党校培训干部，重点不在知识与技能，而是理论与党性，是立足培养能驾驭全局的通才。

郑校长讲得对，我赞成。不过本文将换个角度，即从干部成长规律看党校教育的定位。有两个重点：第一，何为干部成长规律？第二，党校教育如何适应干部成长规律。显然，这两个问题有联系，但不一回事。关于干部成长规律，学界文献多，我读过一些，略知大概。我的印象，当下许多文章谈的是干部成长的条件，比如“自我成长、组织培养、实践锻炼、社会造就、梯次递进”等。不必怀疑，这些归纳很全面，也具体，但若从党校教育的视角看，我认为研究面可收窄一些，并且还可从另一层面来提炼。

怎样提炼呢？最近手头有一课题，与干部成长规律有关。不久前曾与同事有过切磋，受其启发，我初步想到了三条。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正是得了同事的提点，故这三条不是我个人的成果，算集体智慧；而且还只是初步思考，能否最后立得住尚未可知。不过这些日子我日思夜想，反复推敲却不见破绽，我想不应该会错。卖瓜的赞瓜甜，对错当然不能由我说，有自卖自夸之嫌。还是公之于众让读者评判吧！

这三条规律是：

第一，若干部职级与承担的责任一致，那么职级越高，知识更新就迫切。是这样吗？应该是。一个干部从基层做起，然后拾级而上，经年累月，自然会积累起相应的知识与经验，但随着职位晋升，担负的责任不同，这样原有的知识、经验往往会不够用、甚至不管用。道理明显不过，比如有人能当好村长、乡长，却未必能做好县长、市长。10年前，我到河北某市讲学，住在市宾馆。说是一家宾馆，其实就是间招待所。外边看宾馆又高又大，可房内却没卫生间。细问原因，才知当年主事的市长是乡干部出身，宾馆原本就是按招待所设计。

不要误会，举这个例子不是说乡干部有何不好。我的意思是，乡干部职务晋升后，知识、经验应及时更新。否则，眼界不宽，思路不广，总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工作起来会力不从心，好事办不好。俗语说，活到老学到老。普通人尚且如此，何况领导干部要造福一方呢？事实上，职务越高，面对的矛盾就越复杂，需要的本领就越强。若是不补充新知识，穿新鞋走老路迟早会有黔驴技穷的一天。

第二，干部职级越高，履职所需的知识与其原有的专业背景相关性越弱。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普通公务员还是学啥干啥（考公务员还会看你的专业）；但到了市、地（厅局）级以上，就很难再专业对口了。我没有现成的数据，其实也不必有准确的数据，看看现在各省的书记、省长，学啥专业的没有？而国家部委的部长中，又有几人是专业对口的？可见中高级干部履职主要不是靠当年大学提供的专业技能，而是坚定的理想信念与驾驭全局的战略思维能力。

第三，如果有外部监督且监督有效，一个干部成长越快则表明自律能力越强。请注意这里的前提，一是要有外部监督；二是监督要有效。假若没这两个前提，一个干部成长快，就不一定是自律能力强，而可能是相反。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成克杰官居高位，显然不是因他懂得自律，而是监督的缺失。不过一般而言，干部成长还是与自律有关的。要知道，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个干部若不自我管束，为所欲为，哪怕一时逃避了监督，然而法网恢恢，总有一天要被捉，会受到法律惩处。

回头再说党校教育定位。毫无疑问，中央办党校，归根到底是要为党培训干部。这样看，所谓党校教育规律，其实就是党校教育如何适应干部成长规律。换言之，党校教育的定位，必须以干部成长规律为坐标。由此便可得到三点推论：第一，党校要为党政干部提供终生教育；第二，党校教育的重点不是专业技能，而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具体说，是政治理论、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第三，党性教育应贯穿党校教学的全过程。

近平校长多次强调，党校要重点抓理论教育与党性教育。而党校今天的教学布局，体现的正是这样的定位。说到这里有个问题要澄清一下。近来有一种主张，党校招生要和其他培训机构一起竞争。我研究经济数十年，从不反对竞争。但不明白的是，党校提供的教育产品与别人不同，产品不同怎么竞争？你见过卖蔬菜的与卖服装的竞争么？缺什么补什么是对的，可问题是谁会承认自己缺理想信念与党性呢？经验说，理论要靠灌输。既如此党校学员就得由组织选派，而不是相反让干部自己选，如此浅显的道理无需我多费笔墨吧！

也说“以教学为中心”

学校当然是要以教学为中心，舍此无他。这本来用不着多做讨论，可此事似乎一直未能解决得好，至少目前的状况还不尽如人意，需要改进。前些年我在经济学部任教时就曾多次呼吁过，无奈人微言轻，也就说说而已，不管用。这里再写文章，并不指望现在说了就管用，人贵自知，我不会那么想。只是本人已不在教员岗位，身份换了，再没有为自己争利的嫌疑，可以比以前说得更透彻些。

其实不止是党校，我知道的其他高校也大抵如此。据在高校工作的师友说，现在高校也有不少教师不愿站讲台，想方设法往行政部门挤。何以如此？原因是高校里教师地位相对低，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焦点集中在住房与医疗，比如一个教师，教书教到退休顶多也只能享受正处级待遇（即正教授参照正处级福利），而在行政部门做管理，做得好却可到副厅、正厅，这样机会不均等，教师要改从行政也就情理之中、见怪不怪了。

相对来说，中央党校教师的待遇要好些，高半格，副教授参照正处；教授可参照副厅。但尽管如此，同样还是有人想改行做行政。几年前苏荣同志做常务副校长时多次表示对此不理解，而我们做教员的其实都明白，就四个字：“利益使然”。想想看，一个教授要是没有啥行政头衔，哪怕学问再大，课讲得再好，副厅待遇也就到了头。若改做行政就不同，不仅有望到正厅，到副部也有可能，虽然最后未必做得成，但至少有一种想象空间。

这些年，我们讲“以教学为中心”，很多人以为，就是学校的各项工作围绕“教学”运转就行了。这样理解当然不错，但要追问的是，一所学校若把教学作为轴心，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教学水平就一定会高么？我看未必。以教学与科研为例。教学以科研做基础，科研为教学服务，党校一直在这么做，所谓“教学出题目，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讲的就是这种科研服务教学的关系，可实际效果如何

呢？毋庸讳言，科研若说尚差强人意；可教学与学员的期待却有不小的距离。

问题出在哪里？我曾说过，以“教学”为中心归根到底是要以“教员”为中心。是的，一流学府要有一流的教学，而一流的教学必须有一流的教师。这是说，提高教学质量，主角只能是教员，其他人可以帮忙但代替不了教员。教员若不专注教学，旁的人再怎么做教学也不可能好。唱戏的不急敲鼓的急，急有何用？所以以教学为中心不能见物不见人，要以教员为主导，要以教员爱岗敬业、安心教学为前提；否则优秀教员纷纷改行，想有一流教学那是异想天开。

我所以主张办学要以教员为中心，当然不是说行政人员不重要，而是比较起来目前教员的地位的确低了些。说点个人的体会吧。之前我做教员时有件事一直让我感到不爽。教员每次上课，都要由学员热评，当场打分。作为管理手段，让学员打分倒也没什么，无可厚非；而我想不通的是学员考试为何不让教员决定？怎么考学员比如开卷还是闭卷、笔试还是答辩等，教员却没有决定权；甚至连最低分不能低于多少也通常是由管理部门定。

另一方面，与教辅人员相比，教员面对的约束也不对等。学员给教员打分，这样教员有严格“考核”，每年职称晋升，年度评级，皆以学员打分为依据，若打分不够“规定标准”，则一票否决。可教辅人员呢，多年来却没人给打分。按理说，教辅部门为教学服务，服务如何也该由教员给评评分。这样一石二鸟，不仅可提高教员地位，而且可敦促教辅部门改进服务。时下有不少教员反映到校内有关部门办事难。为什么难？设想一下，倘若教员对教学相关部门有评分权，办事还会像现在这么难么？

在去年召开的全国党校教学改革会上，有地方党校的同志讲，办一流党校要有一流名师，这样就得营造出尊师重教的氛围，让当教员的感到光荣。可现在不少学校并非如此，行政色彩过浓，比如有些纯学术会议，台上坐的全是领导，教员就是再有学问，无一官半职也只能坐台下。这种导向，不是鼓励大家做专家而是做官。类似的意见我

在校内也听到过。有教员问，每次学员座谈都要求有关教员参加，可召集方却往往只介绍出席的领导而对教员视而不见，为何不能给教员平等的尊重？

回头再说教员的福利。党校教员并非圣贤，当然会关心福利待遇。由此看，落实以教员为中心，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让教员“有机会”享受到校内的最高福利。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有机会”，不是让所有教员见人有份，而是在制度安排上给教员开一条通道，不做官，教员做得好也能够享有学校的最高待遇。倘能如此，大家也就用不着再往行政部门挤了。退一步，即使将来享受不到某种待遇，教员也只会怪自己而不会怨天尤人。

跟下来，似有两个相关的难题要解决：第一，让党校名师享受校内最高待遇，国家政策是否允许？说实话之前我也有顾虑，但深想应该不是问题。有先例可循，现在中科院院士的待遇就相当副部，自然科学家可以，社会科学家当然也应该行。政策是人定的，我们不应该因为“政策”而作茧自缚；第二，如若将来政策允许，那么哪些教员才可享受校内最高待遇呢？这确实是个难题，但解决的办法一定有，至于用什么办法还是先听听大家的高见，容我另文说吧。

党校讲课“三戒”

在中央党校任教十八年，我最深的感受，是做党校教员不易，讲课难，要讲好课更难。二十五年前曾在高校工作过，也是教书，不过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压力并不想今天这么大。照理说，十八年教龄已不短，在校内外讲课无数，算得上久经沙场。可到如今，每逢上课却仍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不知别的教员怎样，反正我自己上课的前一晚肯定会睡不好。何以如此？我反复想过，在党校任教虽然也是上课，但却有许多不同于高校的地方。

最明显的不同，在高校做教师，面对的是一群年轻学生，有统编教材，目的是传授知识，上课虽未必照本宣科，但那也是一章一节地教，按图索骥，讲得够清楚，学生好考试，就会大受好评。这样两、三个学期下来，教师对教材就差不多了如指掌，讲起来驾轻就熟，自然不会有何压力了。可在党校任教，教员讲授的是专题，题目总在变，没有现成的教材，讲义得自己写。更困难的是，党校学员不仅学历高，而且长期在第一线摸爬滚打，阅历丰富，甚至有的还直接参与政府决策，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怎会没有压力呢？

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说党校与高校的区别，是高校注重学术；而党校强调政治。骤然听，似乎是那么回事：但仔细想，却似是而非。在我看来，党校讲课对学术的要求其实比高校高得多。说过了，高校讲课是传授知识，教师即使不做学术，照样可把课讲好。而党校讲课则是研究问题，没有学术功底是不可能讲好课的。党校姓党，教员当然要守纪律，不可信口开河；但这绝不等于可以忽视学术。政治是什么？中央讲“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这是说，发展就是最大的政治。一个国家要富强，首先得尊重规律，而学术的本质就是揭示规律。由此看，政治与学术并不矛盾，那种违背规律的空头政治，不要说学员不爱听，我们自己也不爱听，更不会信。

时常听到有学员抱怨，党校教员讲课容易脱离实际。是的，换个角度看，这也正是党校讲课难的原因。事实上，高校教师也会有脱离

实际的现象，他们联系实际的本领未必强过党校教员，可为何学生没有这种反应呢？说起来，这其实不难理解，高校学生没走出过校门，他们关心的是考试，所以老师联系实际的好坏，他们无从判断，也无所谓；而党校学员都是党政官员，带着许多实际问题来，而且都希望在党校找到答案。这样期望越高，失望也往往越大。要指出的是，面对学员的抱怨，我们的教员总以为是自己没在基层工作过。这样想也没有错，可并不仅仅如此。理论脱离实际，既有可能是对实际缺乏了解，但也有可能是对理论掌握不透彻。

说到这里，有个现象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些年，党校派了不少教员到地方挂职，补“实践”的课。这些教员返校后，有的教学效果是明显提高了，不过也有少数人，讲课却未见有大的改观。为什么？说到底，还是理论功力不够。别的学科我不知，经济学我清楚，像弗里德曼、科斯这样的大师，也不曾在基层工作过，可他们联系实际的水准绝对一流。所以如此，我看还是得益于他们的理论功底。有理论在胸，看现实便入木三分；否则，哪怕你触摸到了实际，也往往是雾里看花，不明就里。

党校讲课难，再一方面，就是文风。最近习近平校长强调要树立优良文风，而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则倡导党校带头。以前我总认为，是领导在台上作报告，需改进文风的是领导，文风改进的重点，是在台上而不是在台下。其实，我们教员平时讲课不也是在台上么？既然在台上，当然也就有改进文风的必要。说我个人的体会，党校教员要改进文风，至少做到三戒：一戒空对空；二戒就事论事；三戒人云亦云。此三点重要，让我展开来说说。

所谓“空对空”，不是一般的讲空话套话，而是特指用文件解释文件。党校教员有没有这种“空对空”的现象？最近翻阅了一些教员的讲稿，发现问题还真不少。比如有的讲稿，通篇都是某文件指出，就是看不到教员自己的分析。殊不知，学员对文件也是非常熟悉的，从文件到文件地讲授，教员讲起来空空如也；学员听起来单调乏味。别误会，我不是说教员不能讲文件，讲文件是没错的，也应该讲；但

学员进党校，不仅是要知道文件怎么讲，还要了解文件为何这么讲？背后的理论支持是什么？若仅停留在文件本身，浅尝辄止，学员当然会感觉“空”、不止渴。

所谓“就事论事”，我指的是讲现实缺乏理论参照与历史参照，动不动就是“我认为”。这里有个误会，理论联系实际，很多人以为就是对实际开“处方”。有的教员为了急于联系实际，不做理论解析，不做历史比较，一开口就出招。学员说某些教员“情况不明胆子大，心中无数点子多”，批评的就是这种现象。其实据我所知，学员并不要求教员直接替他们出招，而是希望学会怎样用理论分析实际。前不久四川一位来党校学习的领导讲，由于公务繁忙，平日很难静下来读经典，来党校是想听教员多讲点经典，充充电。可有的教员呢？却十分热衷看门诊，结果欲速则不达，所出的招不管用，学员反而觉得脱离了实际。

所谓“人云亦云”，是说我们的教员缺乏独立思考，讲课很少有新话。有的讲稿一用就是两三年，一字不改。讲稿内容，不是领导人怎么说，就是别的专家怎么说，自己好像只是个传声筒，一堂课下来，学员摸不着边际，不知教员到底怎么看。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大抵有两方面：一是教员缺乏理论勇气，怕讲错话，不敢担当；二是对问题研究不深不透，没有主见，讲不出新话，也怕讲出来贻笑大方。古人云，师者，传道解惑。尤其是党校教员，若不下苦功做研究，只是将人家的观点照搬，学员怎会满意呢？设身处地想，假如我们自己去听课，别人尽是陈词旧调，没一点启发，你会怎么想？

好了，篇幅所限，就说这些。要顺便说明的是，我写这篇文章，并不代表自己就做得好，更非经验之谈。现在改做教学管理，总得做些思考，而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也算是职责所系吧！

党校讲课为何要有纪律

党校姓党，党校讲课要守纪律不必说，天经地义。原则上，我也同意“研究无禁区，讲课有纪律”的提法，不过深想也有困惑：“研究”与“讲课”骤然听好像不一回事，但其实两者却很难分得开。讲课需要研究，不研究讲不好课，多数情况，讲课就是研究成果进课堂。若“讲课有纪律”是指有些研究成果可进课堂，而有些不能进，那么判定进不进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是的，一般地谈论“讲课有纪律”，大家都应该会赞成，但具体到“纪律”究竟为何，见仁见智，却很难有权威的意见。这些年，我听得最多的是“与中央保持一致”。保持一致当然对，也必须；可教员讲课涉及面广，而中央并非对所有问题都有口径，困难的是那些没有口径的问题怎么讲？教员能否天马行空？我看恐怕不能！早年曾有教员在课堂批评地方政府而引起轩然大波，并非教员背离了中央精神，而是有些事实没弄清。

我曾撰文说党校讲课难，这不仅仅是指党校的听课对象特殊；另一重要的原因，是“研究无禁区”与“讲课有纪律”的关系难处理。我自己在党校教书二十年，说实话，到今天讲课仍然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并不是不熟悉讲题内容，而是研究成果进课堂的尺寸不好拿捏。最近我与不少教员聊过，大家也深有同感，所以一致希望校方能“讲课纪律”规定得再明确些，免得教员心里没底，讲起课来提心吊胆、无所适从。

教员的担心我理解，原本是打算以教务部的名义写篇文章，但想来想去却觉得不妥。不是不该写，而是不容易写得好，就算勉强写出来大家也未必认同。既如此，所以不如我自己先动笔写，说说我的看法，投石问路，哪怕讲得不对，那也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大家尽可当作饭后闲言，一风吹。下面是我的一些思考，不一定成熟，就写出来与大家讨论吧：

第一、要与中央的精神保持一致。毫无疑问，这是党校教员必须共同坚守的底线，是铁的规矩。事实上，不光是党校教员，就是普通党员也要自觉遵守。中央办党校，目的就是为了统一高中级干部的思想，让他们深刻领会中央的精神。你若有什么不同见解那是你个人的意见，可以通过党的组织向中央反映，但绝不可在课堂公开讲。要知道，党校不是私家会所，课堂上不允许有杂音，绝不允许因错误言论而把干部思想搞乱。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党校教员讲中央精神只能照本宣科，当传声筒。作为专家，教员一方面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同时也可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对中央精神进行学理分析。比如中央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那么教员就得给学员讲清楚中央为何要这样规定，理论根据是什么，落实过程中会有什么阻力，处理此类问题有何国际经验等。总之，教员的任务是帮助学员吃透中央精神而不是去怀疑中央精神。

第二、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立场。前面说了，中央精神是管全局的，而对某些具体的问题，中央未必有口径。比如房价，城市交通等，像此类政策操作层面的问题，不可能事事要中央表态，这样教员可以自己研究，也可谈自己的见解。但要强调的是，立场必须站在广大人民群众这边，既不能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说话，也不能为博得掌声而哗众取宠。这里的关键是要把自己的利益搁置一边，不可从个人的得失去评论政策。

举个例子。假如你在某国有上市公司兼职做独董，政府提出要控制高管薪酬，而你却在课堂上反对。显然，在这件事上你的言论不具公信力。因为你是利益相关人，就是讲得天花乱坠也怕没人肯信你。别误会，我这样讲不是反对别人做独董，我自己不会做，但别人可以做。我想说的是，作为党校教员，课堂上要代表多数人说话。前几年有某知名学者疾呼政府救市而受到公众质疑，原因就是他的子女在证券公司任高管。

第三、要坚持事实求是、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党校教学采用专题讲授，强调“问题导向”。这样我们讲解或分析某个现实问题，无论从党性原则还是从学术规范看，都必须尊重事实，要先把事实弄清楚。毛泽东同志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告诫也应成为党校讲课的一条纪律。否则，不下功夫做深入调查，对事实不清不楚，仅凭道听途说就妄加评论，小处论，在学术上不严肃，大处讲有悖于党性原则。不要说在党校不允许，在其他高校恐怕也是不行的。

上文提到曾有教员没弄清事实就批评地方政府而触犯众怒，这现象其实今天仍然有。据我所知，我们有的教员不肯花功夫去做实地调研，备课用的全是二手资料，而当学员在课堂对事实提出质疑时，教员往往张口结舌无以应对。更有甚者，有的没弄清事实不认错，反而还摆学者的架子，强词夺理混淆视听。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毁坏了教员自己的声誉，也损坏了党校的形象。

第四、要恪守学术规则，对待学术争鸣不可上纲上线。党校教员要有胸怀，要尊重同行的研究，你不赞成别人的观点可以，但要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扣政治帽子。尤其是当别的学者不赞成你的观点或写文章批评你时，也不得在课堂上恶语相向。党校课堂可以进行学术讨论，但不能搞学霸作风，绝不可利用党校讲台宣泄个人不满，公报私“怨”。

关于讲课纪律，目前我所想到就这四条。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教员的学术功力可以分高下，讲课艺术也可各不相同，但讲课纪律不能有分别。不管年轻教员还是资深教授，若认为上面四条可作为讲课纪律，那么纪律面前就得一律平等，要共同遵守，谁也不能例外。

说“名师”

一流的学府，得有一流的名师。何谓名师？顾名思义，名师是指那些学富五车而大名鼎鼎的老师。古往今来，写老师的文章多，不计其数，而我最推崇的还是韩愈的《师说》。一句“传道授业解惑”，前无古人，把老师的职责写得淋漓尽致。本文论“名师”，当然不是教人如何出名，而是讨论，第一、怎样的老师才算名师；第二、中国当下为何缺名师。这两个问题大，仁者见仁，让我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我眼中的名师，最重要的一点，名师首先得有真学问。业精于勤，不勤则不精。这是说，名师一定是勤于业的。俗语说，板凳要坐十年冷。不经寒窗苦读，腹中空空，无论你怎样有名，那也不是名师。当今新闻媒体发达，尤其有了互联网，要出名几近易于反掌。比如有的教师不埋头研究，而整天热衷于看电视，有的甚至不惜在网上靠发表骇人听闻的言论来博取眼球。说起来，这些人名气也不小，可我看却算不上名师。投机取巧，不过浪得虚名而已。

作为名师要有真学问，但仅有学问还不够。人们常常把教师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既不盖房子，也不画图纸，怎会如此形容教师呢？我的理解是这样：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是说，欲治国，先修身。而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当然要在品德方面成为标杆。尤其是名师，让人仰望的应不止于学术，更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品德，其所求，是凡人难以企及的，如奉献；其所不求又是凡人难以割舍的，如功利。名师的学问也许会被后人追赶，但品德却难以被人跨越。

名师的另一特性，是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当然，名师有名师的高度，但名师的高度绝不是飞扬跋扈，唯我独尊，而是体现在眼界与境界上。越是名师，就越有谦逊的品行，我读书教书数十年，接触的老师无数，我发现，但凡名师皆有大气度。我自己的导师宋涛教授就是例子。宋老师从教七十余载，桃李满天下，可他从不摆学术权威的架子。当年我写博士论文，他提修改意见后总会说，你可以不同意我。

有一次我真的对他的意见提出了异议，没想到他思考片刻就立马承认是他错了。试问这不是名师风范是什么？

再有一点，名师所以为名师，就是他（她）与一般老师不同，一般老师主要是授业，而名师除了授业还要传道。当然，授业重要，不授业无以传道，但“业”却又不能代替“道”，“业”是知识、技能，是为“道”做铺垫的，据说一万公斤玫瑰才能提取一公斤精油，若把一万公斤玫瑰比作“业”，那么精油才是“道”。《说文解字》讲：“道，所行道也。”而师者所传之“道”，应该指道理、道德、道义，这与“道路”何干？拆开想其实也有理。“道”是“首”加上走字边，联想起来，是指头脑走的路径，即思想、思路。所谓传道，直白地说就是教人规律与思维方法。这样看，名师同时也是哲人。

清代有位国学大师，叫王闿运，此人是曾国藩的老师。他把学问分为三等：一为诗文之学；二为功名之学；三为帝王之学。所谓诗文之学，纯粹是文人墨客附庸风雅，无病呻吟；而功名之学，则是为了高官厚禄，顶戴花翎，说白了还是为一孔私利；而帝王之学却与前两种不同，为的是天下苍生，江山社稷。是的，真正的名师，传授的学问一定能造福社会。别的学科我不知，比如经济学，上世纪末“厉股份”（厉以宁）、“吴市场”（吴敬琏）在国内家喻户晓而成为名师，说到底，是因为他们传授的学问推动了改革。

转谈第二个问题吧。上文提到了厉、吴两位教授，不是说国内经济学名师就只他们两位；而且其他学科也有名师。不过有个现象值得研究，近些年，高校教师的学历普遍提高了，没博士学位已进不了高校；而论研究条件，更是昔非今比。可令人不解的是，为何现在名师反而少了呢？就说中央党校，历史上党校也曾是名师辈出。提起杨献珍、艾思奇、郭大力、王学文、何其芳等党校教员，至今学界还如雷贯耳，肃然起敬。而今天的党校名师虽然有，但却凤毛麟角。对此怎么解释呢？

我想到的答案有两个：第一，是官本位作祟。我认识的不少政府官员，当年其实就是高校的教师，而且是很有潜力成为名师的教师。

可惜当他们有点学术成就后便改行从了政，人在官场，不能专心做学问，也不再教书，当然也就成不了名师；第二，利益诱惑。应该说，今天高校教师面临的诱惑实在多，一旦出点名就忙于四处赶场，做独董、当顾问，日进斗金，财源滚滚。但久而久之学问荒疏，低水平输出，这样终究只能昙花一现，与名师无缘。

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天党校名师少是由于校方推介不力。有这种想法可理解，但我认为这观点是错的。大约十年前，校方就曾有意推名师，而我当时就不赞成。我的看法，名师既不能靠行政认定；也不能靠宣传包装。出名师的关键，是要靠激励机制让教员爱岗敬业，专心学术。前些天王怀超教授动议，说应让党校名师享受副部级待遇。主意虽好，可操作起来难。而我的建议是，只动内部分配，比如不突破工资总额而档位拉开，让骨干教师工资至少再增多五倍。这样避难就易，诸位想想看，其效果是否也与怀超教授的办法异曲同工呢？

谈学术功底

前文说，党校教员讲课需“三戒”：一戒空对空：二戒就事论事：三戒人云亦云。话虽好说，然而知易行难，真正做起来不容易。总地讲，党校讲课我以为要把握好三个维度，即理论维度、历史维度、现实维度。不结合历史与现实讲理论，理论没有针对性，那是无的放矢；而离开理论与历史讲现实，又难免就事论事，缺乏深度。学员评价某堂课讲得好，通常是三个维度结合得好，否则顾此失彼，就算你口才再棒，学员也会觉得美中不足。

之所以要强调这三个维度，是因为在我看来教员讲课的思想性确实要比“口才”重要。10多年前我在经济学部管教学时，杨春贵副校长就曾对我说过，教员讲课思想性是第一位的，口才在其次。是的，我也有同感。只要你有研究，哪怕有点口吃也无妨，学员也肯定；若对问题无研究，即使你口若悬河，学员也不会认可。事实上，这些年党校有些课学员评价不高，大多不是教员口才差，也不在教员的表达风格，我曾听过张绪文教授的课，也听过陈雪薇教授的课，论风格，两位教授迥异，可学员既欢迎张绪文，又叫好陈雪薇。为什么？说到底学员注重的还是讲课的科研含量。

言归正传，还是谈“学术功底”吧。所谓“学术功底”，通俗地讲，就是“书底子”。不读大量的书，没有书垫底，就不可能有深厚的学术功力。在党校任教，大家肯定要读书，这点毫无疑问。问题是党校教员应该读哪些书？我个人的体会，最该读的是经典与历史。为何要读经典与历史？因为经典是前人浓缩了的智慧，至少已经过数十年，上百年的打磨，颠扑不破。这样，读了经典，我们就有了看世界的理论参照。读历史也如此。历史是一面镜子，懂得历史会让我们少走弯路。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个教员若不懂历史，就好比行走在深山里找不见路标，没人给带路，迟早要迷失方向。

这样看，一个教员学术功底如何，其实就取决于是否熟读了经典与历史。也许有人问，为何一定要用经典与历史来构筑“学术功底”

呢？读当代人的书也不也很有用么？我的回答是，当代人的书当然要读，但却不是构成“功底”的要素，读今天的论著，虽然可开阔视野，启发思考，但这类著作多是一家之言，未经时间考验，日后极有可能被推翻。由于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不具权威性，所以不能作为观察现实的坐标。而经典与历史不同，经典已经固化了，历史也是死的，无论将来过去多少年多少代，经典不能改写，历史也不会改变。它们是结晶了智慧与知识，这才是我们做学问的功底。

另一方面，对党校教员来说，唯有读经典与历史，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在讲台上你才能举重若轻。设想一下，假若讲解某个现实问题，你既有经典理论的指引，又有历史经验的佐证，讲起来你是不是会很自信、很潇洒？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书读得多了，你更加自信，气质也会跟着提升，若再加必要的讲课技巧，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你的课一定是满堂彩。我留心过，有的教员讲课学员不爱听，其重要原因就是既缺乏经典武装，讲不透；又缺乏历史参照，讲不活。这就好比盖房子，若无好的设计图纸，又无砖瓦灰石，怎能盖漂亮呢？换句话说，如果教员理论上不占优势，与学员在同一平面上说事，你的课是很难博得掌声的。

再说“理论联系实际”。上文讲到，教员上课要把握三个维度，而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借助理论维度与历史维度来研究现实维度的问题。如果把理论维度作为纵坐标，历史维度作为横坐标，有了这两个坐标，那么我们就可大致确定现实维度的方位。有个问题需要提点一下，不少人以为，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针对具体的事件开药方，其实这种看法是错的，要知道，具体的事件日新月异，总在变化，比如去年房价大跌，今年房价又大涨，若上学期你给学员讲怎么救房市，这学期又给学员讲如何打压房价，如此联系实际，你疲于奔命，学员也无所适从，到头来怕是费力不讨好，甚至授人笑柄。

那么究竟该怎样联系实际呢？让我先举个例子吧。比如用枪打鸟，鸟就是我们要联系的那个“实际”，经典就是枪与子弹，而历史经验，就是眼睛、准星，目标三点一线才能击中鸟。现在我们有了枪

和子弹（经典），瞄准方法（历史经验）也有了，可就是那个鸟（目标）不好把握，因为鸟是飞动的，活靶难打，怎么办？我想到的办法，就是要等那个鸟停下来，只要它停住，我们就可在固定的位置打固定的目标。问题在于，鸟何时会停下来？会停在什么地方？懂点历史的人知道，鸟通常会在夜里归巢，这样，我们就直接打鸟巢好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我想说的是，联系实际不必直接联系某件具体的事，而是要联系背后的政策与机制。政策与机制就是那个鸟巢，具体的事会不断变动，可政策与机制相对稳定，只要抓住政策与机制，咬住青山，讲课的针对性照样有，而理论分析的命中率则可大大提高。

把理论联系实际定位为理论联系政策（机制），是我多年来讲课的心得，管用不管用不敢保证，不过若有哪位教员正为联系实际犯难，我想这个办法倒是可以试试的。

论学术框架

曾撰文谈“学术功底”，本文再说“学术框架”，两者有联系，但不完全是一码事。我自己的体会，当好一个党校教员，讲课必须要有学术框架，否则信口开河，满嘴跑马，别人怕是难以拿你当专家的。尤其在中央党校，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很特殊，不仅见多识广，而且也都能说会道。他们进党校学习，不是对问题没思考，而是想听听教员的理论讲解，当教员的若无学术框架，就事论事，怎可能让人心悦诚服呢？

时常听学员讲，党校教员的优势是懂理论。何为懂理论？说白了就是有学术框架。不错，这正是我们教员讲课与领导干部作报告不同的地方。比如同样讲中央文件，领导干部重点在传达中央精神，部署落实；而教员则侧重学理分析，不仅要讲中央精神是什么，而且要回答为什么，即重点在分析中央精神背后的学理根据。换句话说，党校教员讲课区别于领导干部讲话，关键在教员有专家视角，不是简单地用文件解释文件，而是力求从学理上讲深讲透。

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学术框架呢？我理解的学术框架，一句话，就是学者观察世界的理论坐标。不过她不是指某个点，而是一个参照体系。举个例，历史上有“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解牛何以能得心应手？绝对不是因为他肯用蛮力，而是熟知牛的生理结构。再比如画画，一个画家要把人画好，了解人体结构比例便是基本功。教员讲课也如是。一个问题摆在面前，若不先找到学术框架，讲起来就会没章法，学员听起来当然也就懵懵懂懂不得要领了。

还是说我自己的经验吧。当年读大学，课余时间几乎全泡在图书馆读期刊，那时候有件事让我很困惑，就是读张三的论文觉得张三对，读李四的论文觉得李四对，而张三与李四的观点大相径庭我却无从判断对错。为此，我曾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怀疑过自己是否适合做学问。到了大二，斗胆把自己的困惑告诉了老师，老师说：那是你没

读经典，没有学术框架。一语点醒，从此我改弦易辙，埋头读经典。几年寒窗，果然自己对许多问题渐渐有了判断。

是的，无论我们做研究还是讲课，都得有学术框架。没有学术框架，看问题就往往如老虎吃天，无处下口。说得再形象点，学术框架就好比一张交通图。你要去天安门，从颐和园出发怎么走？假如你手里有交通图一看便知。这是说，若有学术框架在胸，分析问题也就有了逻辑路径，这样我们不仅不会迷失方向，而且可以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即便不小心走错了，也能按学术框架随时校正，至少不会闹出南辕北辙的笑话来。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问，学术框架既然如此了得，那么框架从何而来呢？我的回答是，假若你天赋足够高，又有深厚的学术功力，你可以自己建框架。但若非如此，则另有一条捷径，去借用经典著作的框架。我们说，经典之所以称为经典，首先是她结晶了前人的智慧，经历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考验，颠扑不破；同时经典还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有自己的学术框架。古往今来，没有学术框架的论著，哪怕曾经轰动一时，但大浪淘沙，最终很少有立得住的。

我这样讲，当然不是说有学术框架的著述就一定能成经典。我的意思是，被传承的经典，一般都有学术框架。以经济学为例，亚当·斯密研究分工与贸易，用的就是绝对成本的框架；而李嘉图用的则是比较成本的框架；马克思研究剩余价值，用的是“商品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的框架；而庇古研究社会福利，用的则是收入均等化的框架；再有，马歇尔研究价格，用的是局部均衡的框架，而凯恩斯研究就业，用的则又是宏观总量平衡的框架。

不用再举例，经济学是这样，其他学科的经典我想也如此。所以要想掌握学术框架，只有多读经典，舍此无他。经典读得多了，日积月累，你知道的学术框架才会慢慢多起来，碰到问题，你才能随手拈来，游刃有余。想想看，当下党校真正叫得响的教员，有谁是不重视读经典的？最近我们正在选编中央党校“老讲稿”，我发现，建国初

期党校的那些名师不仅个个熟读经典，而且讲课的学术框架也都非常清晰。他们讲课受欢迎，这应该是原因之一吧！

另外还有个问题，本不必说，但细想还是说说好。上文提到，但凡经典皆有学术框架，可经典著作很多，教员讲课如何选择呢？我以为有两个原则：首先，要先选本学科经典。对一个问题，不同学科经典的分析框架往往不同，教员备课最好选本学科的经典。不是别的学科经典不能用，而是隔行如隔山，用起来未必顺手；其次，要找准问题对应。即是说，你分析的问题要与经典所分析的问题类同，不然张冠李戴，反而容易弄巧成拙。

最后说一句。学术框架是我们做教员的必备工具，也是看家本领。古人讲：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假如你现在讲课还没有学术框架，不要紧，也不必懊恼。只要从今天起重视起来，虚心向经典学习，向同行学习，下足功夫，待以时日你必有意外的惊喜：不仅课会讲好，研究也会更上一层楼。不信你就试试看！

向经典学什么

原本是想写“怎样导读经典”，可动笔前却忽然改了主意，决定还是从听课者的角度谈，说说向经典学什么。所以这么做，一是自己虽从教近二十年，资历不算浅，但党校藏龙卧虎，写“怎样导读”有说教之嫌，不妥，也不敢；二是我曾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与学员朝夕相处，知道当时同学对讲经典有何期待，而这些并非所有教员都了解；三是先说向经典学什么再谈怎样讲，这样也似乎更加顺理成章。

关于怎样学经典，当下有个流行说法，就是要学作者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读大学起我就听到这样的教诲，但在今天看，这说法虽不全错，但也不全对。比如以“学立场”为例，立场是指人们的利益站位，即代表谁说话。这样看，马恩经典作家的立场无疑是站在工农大众这边，学习他们的立场当然没问题，不仅应该学，而且必须学。可问题是除了马恩经典外，学界还有许多其他经典，这些经典我们要不要学？如果要学，是否也包括学习他们的立场呢？

这样提问，并非刻意吹毛求疵。举我知道的例子。凯恩斯 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是学界公认的经典，也是宏观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有人说，凯恩斯写此书是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服务的，对此我不怀疑。可是《通论》不仅一度被西方国家奉为国策，而且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金融危机时，我们中国也借鉴了。这怎么解释？看来，学经典未必一定要赞同作者的立场，只要她提供的分析工具有用，我们也可以学。

再说“学观点”。学经典当然要重视学观点，但要指出的是，经典的观点都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并按一定的逻辑框架提炼的，如果今天的条件仍与历史相若，经典的“观点”就得坚持；但若不是这样，那么就得结合实际加以修正，不可照搬。近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说，某部经典的某个观点错了。其实，如果你再去细读文本，并从作者的分析前提出发，依照经典的学术框架，会发现作者的推理并没有错。你所以认为错，不过是约束前提变了。

比如按劳分配原则，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可当前中国实行的并不是单一的按劳分配，而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这是否证明马克思的观点错了呢？不是的。因为马克思的分析前提是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而中国现阶段却是多种所有制并存。前提不同，推论当然不同。毛泽东曾提出反对教条主义，陈云也讲“不唯上，不唯书，只为实”，我体会，他们绝不是反对学经典，而是强调要立足实际，不要固守经典的某个具体观点与词句。

至于“学方法”，原则上我赞成，但需要分层次。一般地讲，方法有三个层面：一是哲学层面，即世界观。比如学马恩经典，重点要学辩证法与唯物史观；而对其他经典中的唯心主义东西，就不能学；二是学理层面，即经典的学术框架与推理的逻辑路径；三是技术层面，这主要是指具体的分析手段，比如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定量分析等。个人以为，领导干部学方法，关键是学前两个，那是“论”与“道”；技术方法属“技”和“巧”，也可以学，但不能喧宾夺主。

以上说的是怎样学经典，若转从教员的角度看，那么经典该怎样讲呢？要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两个情况要先明确：第一，党校学员不同于高校学生，学生以读书为天职，而党校学员主要职责是工作而非读书；第二，党校的学制短，教学时间有限。高校讲一部经典通常会用上一学期，甚至一学年，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读文本；而党校不同，讲一部经典通常只用两小时，学员也不可能通读文本。由此决定，党校讲经典就不可能象高校那样一章一节地讲，那样既不必要，也不现实。

然而困难在于，讲经典必须贴近文本，不贴近文本，教员很容易把经典讲成概论；可要完完全全照文本讲，教学时间又不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怎么办？想来想去，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抓重点，即既贴近文本，而又不面面俱到。这几年我在党校听过不少课，很多老师过去其实也是这么做的。现在的关键，是要研究重点该怎样抓，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有三个方面我认为重要，让我分点说：

其一，要先交代经典针对的问题与背景。一部经典得以传承，一定有她的针对性，不可能是无病呻吟。既如此，那么教员讲经典就得先告诉学员作者针对的问题是什么，为何要针对这个问题，当时的历史背景又怎样。这么做不是要故弄玄虚，而且有助于集中学员的注意力，让学员带着问题听课。但要注意的是，背景介绍的话语不能太多，要反复锤炼，引人入胜；不然泛泛而谈，头开不好，学员没了兴趣后面就难以驾驭了。

其二，要讲清经典的核心观点与学术框架。党校授课时间有限，在课堂上只能讲核心观点。为把学员带入文本，教员一方面要依托经典本身的学术框架（推理路径）讲，同时，整个推理过程也要紧贴文本，要善在关键处引“原文”。这样才能把推理过程变为导读过程，让学员不仅明白经典的“观点”从何而来；而且能学到经典的分析框架。

其三，要联系实际并有自己的观点。学理论要管用，理论不管用，你讲得天花乱坠也不会有人爱听，所以讲经典必须联系实际。不过联系实际不能强行对接，既可联系工作实际，也可联系思想实际；另外，教员讲经典还得有自己的观点，评论经典不要说套话，要重点指明经典的前提与今天的实际有何异同，哪些结论应坚持，哪些结论应发展、怎么发展。

教员若能把握这三条，经典就应该算讲清楚了。当然，讲经典仅仅只是清楚并不够，还得有适当的讲课艺术，语言要尽量通俗，难懂的地方要举例子。总之，经典不仅要讲清，而且要讲活，唯有这样经典课才可能成为党校品牌，大放异彩！

关于“讲课艺术”

讲课有没有艺术这回事？我的看法当然有。虽然我曾说过，一堂课讲得好不好，首先要看教员是否有思想，能否对学员有启发，口才在其次。但这并非说口才就无关轻重，相对思想性，口才的确在第二位，不过，一个教员要是既有思想，又有口才，两全其美岂不善哉？

我们都曾做过学生，撇开大学不说，从小学到中学，为何有些老师讲课我们爱听，有些老师讲课我们却不爱听？照理中小学教师讲的都是教科书，是传授知识，彼此思想性不应有太大差别，可受欢迎的程度为何会不同？说到底，是教师讲课的艺术有高下。其实不止老师，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多的是。比如领导作报告，同样讲经济形势，有人讲得妙趣横生；而有的却让人昏昏入睡。我曾听过朱镕基总理的报告，观点对错见仁见智，单论讲话艺术，我认为无可挑剔。最近“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正在热销，不信你再读读看。

实不相瞒，年轻时我十分留意别人的演讲技巧。大学期间，曾读过不少名人的演讲录，不是我追星，而是他们的演讲实在有感染力。也曾试图寻找规律，苦思冥想，可直到毕业仍不得要领。所幸的是，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王时杰教授口才好，操四川口音，说话抑扬顿挫，听起来很有韵味。而他最大的特点，是讲问题总能化繁就简抓住要害，并恰到好处地给出例证。也是巧得很，那时我正好看到卡耐基的一本小册子《语言的突破》，一夜间大彻大悟，有如醍醐灌顶。我今天的讲课风格，自认为是得益于《语言的突破》的提点，当然更多是王时杰教授的真传。

其实说起来，讲课艺术并不神秘，不过由于人们审美情趣不同，对何为讲课艺术难有统一的标准。就像写文章，文无定法，我们很难说得清一篇文章要按什么标准写，但一篇好文章，却往往又能得到读者的公认。讲课亦如此，虽无一致的标准，但依我多年做教员的经验，有三条我认为最要紧：1、三个清楚：即想清楚、写清楚、说清楚；2、深处求新，浅处求胜，通俗地讲就是深入浅出；3、掌握节奏，推动

互动。字面看，这三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要做到出神入化却非一日之功，需反复操练。为表达方便，下面让我分点谈吧：

第一，三个清楚。我认为这是对教员讲课最起码的要求。不能想象，教员自己没想清楚的问题，会给学员讲清楚；退一步，即便教员想清楚了，那也未必能讲明白。因为从想清楚到说清楚，中间有个环节就是写。今天学校为何要求教员写讲义，我想这不单是为了方便学员预习；更重要的，是要督促教员把问题想透彻。诸位应该有这样的经历，有时某个问题自以为是想清楚了，可一旦落实到纸上，却发现写不清。写不清怎能说得清呢？

写到这里，有个现象要说一下。当下我们有的教员讲课只注重PPT（课件），却不重视写讲稿。事实上，讲稿比PPT重要得多，写讲稿的过程，本身就是研究过程，不下功夫写讲稿，研究做得不扎实，PPT再花哨有何用？徒有其表，课不可能讲得好。经验说，教员即使能把问题百分百讲清楚，学员也只能理解90%；教员若只讲清90%，学员则只能理解70%；教员要是一知半解，那么学员一定是不知所云。由此看，教员要讲好课，写讲稿绝不可敷衍，只要讲稿真写得好，哪怕你在台上念，学员我想也不会给低分。

第二，深处求新，浅处求胜。这是说，在备课写讲稿前，研究要深入，要勇于求新；但在写讲稿或讲课时，语言要浅白，要通俗易懂。牛顿说过，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可发现新领域；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可发现新定律。是的，研究问题应从简单到复杂，想得愈深入愈好，但讲课相反，表达则是愈通俗愈好。真佛只说家常话。大家去看看《毛泽东选集》，看看《邓小平文选》，是不是一读就懂？其实毛主席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邓小平讲“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语言虽朴实无华，但道理却博大精深。

关于讲课艺术我自己有一点体会，就是要把讲理论与讲事件结合起来。一堂课两小时，假若从头至尾光说理论，课堂会显得太沉闷；但若通堂都讲事件而不讲理论，学员又会感觉肤浅。而且还有个技巧，就是要善于用小事件来讲大道理，比如亚当·斯密讲分工理论，用的

就是工厂制针的例子；科斯讲产权理论，用的是工厂排污的例子。别看这些例子很平常，但你能用好这些例子，讲起课来将有如神助。

第三，掌握节奏，推动互动。教员讲课要注意调节课堂气氛，有两个要点：一是讲解的节奏；二是课堂互动。记得卡耐基说过，成年人集中注意力一般每十五分钟为一个单元。也就是说，超过十五分钟，人的注意力会分散。既如此，那么教员讲课就得把握这个节奏，每过一刻钟，就不妨放松一下，或讲个笑话，或插入一个小故事。不过笑话与故事要紧扣讲题，不得游离太远；至于推动互动，办法很多，既可向学员发问，也可让学员提问。不过这并不是最好的互动形式，想当年，朱镕基总理来党校讲课，就不曾让学员提过问，可大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与会意的笑声，这其实也是互动，而且是最高境界的互动。

当然，我并不是说大家都得去仿效朱总理，他的演讲极富个人魅力，别人想学也未必学得来。本来，教员讲课就是为了传道，只要能把问题讲清楚，学员爱听，一切管用的讲课方式应该都是艺术。这样看，东施效颦大可不必，同时我们也用不着把讲课艺术看得太神秘而作茧自缚。

我看“研究式教学”

不久前延安干部学院陈燕楠一行造访，希望一起探讨如何搞“研究式教学”，有人登门送教，机会难得我们当然不能错过。那天成志先介绍了中央党校的做法，燕楠也讲了他们的有关情况。本来我不打算发言，可大家看我做教员出身，一定要让我说点看法。没准备，即兴讲，言出由衷，结果燕楠说对他有启发。不管是真是假，也许是客套话，不过即便那样我也想写出来与诸位切磋。

昔日的同窗今天不少在高校任教，每每同学聚会，总有人说他们高校是重学术，党校是重政治。幸好我之前也在高校工作过，对他们并非一无所知。我的看法，党校姓党，党校教员要重视政治理所必然，没有错，但这绝不意味着就不重学术；而高校重学术，其实也只是针对硕士生、博士生，给本科生讲课主要还是重知识。事实上，党校讲课对学术的要求并不低，某种意义上甚至比高校更高。

不是我夸大其词。摆明的一点，党校的学员都是高中级干部，非比以往，今天的学员不仅实践经验丰富；而且都有高学历，至少一半以上是硕士，有博士学位的也为数不少。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你应该可以想象党校教员讲课有多难。不信去看看党校每年学员的“两带来”（一个实际问题与一个理论问题），哪一个问题不尖端？若教员无厚实的学术功底，光重政治怕是难以答疑解惑的。

是的，党校教员不能光重政治，同时也要重学术。于是这就带出了今天的话题，党校如何搞“研究式教学”。这些年，党校的教学改革风生水起，各教研部（所）也各显神通。诸如“案例教学”、“研讨式教学”、“现场教学”等被逐步引入课堂，教学方式别开生面，学员也好评如潮。可问题是这种形式的创新是否就等于“研究式教学”呢？

倘若让我说真话，回答是“不一定”。以案例教学为例。几年前本人也曾是案例教学的积极鼓动者，而现在之所以热情不再，是因为当下有些案例课实在缺少“学术”含量，尽管每次学员评分都很高，

但我认为那不是对教员的肯定，是学员自己评自己。就好比唱一台戏，教员自己没唱功，当不了演员只报幕，戏唱得再好与报幕人有多大关系？我甚至担心，这样的案例课若是弄多了，长此以往教员讲理论课的武功会废掉。

当然，我并不是一概否定案例教学。其实，党校目前有的案例课就很好，不仅学员欢迎，同行专家也肯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员学术功力深，自己有见地。这是说，一堂课是否是“研究式教学”，关键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要看教员是否有学术框架，是否能将学员带到学理层面对问题作理性分析。另外，研讨式教学、现场教学等也如此，别看教员与学员有互动，但若无学术含量，就事论事，照样也不算“研究式教学”。

说了这么多，那么到底何为“研究式教学”呢？依我看，恐怕有四个要素不可或缺。一是问题导向；二是学术框架与科研含量；三是理论维度与现实维度的照应；四是国际比较与历史参照。

不错，一堂课算不算“研究式教学”，首先要看它是否从问题出发，针对的是不是大问题。所谓大问题，就是党和政府关心的大事，而且解决起来有难度。如果教员抓不住问题，或者讲的问题只是自己感兴趣而学员不关心，那么你讲课不是无的放矢就是孤芳自赏。所以教员选择问题必须有针对性，最好富有一定的挑战性，否则浅而空，你很难将学员带动起来一起思考。

关于学术框架与科研含量，之前我曾有专文谈过，这里不多说。只强调一点，讲课有学术框架不是简单地用经典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是指有分析问题的逻辑路径。不少人以为讲课有科研含量就是多引经据典，贴标签，其实这想法是错的。引用经典当然必要，我不反对；但更重要的是要用经典的分析框架推出自己的见解，不人云亦云。这样让学员在接受你观点的同时，也学到分析框架，日后当他们遇到类似问题时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所谓理论维度与现实维度的照应，有两个方面，一是讲理论课要针对现实问题；二是讲现实问题要注重学理分析。总之教员无论讲什

么课，理论与实际都不能脱节，要双管齐下相互照应。值得特别提点的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有机地联系，既不可牵强附会，也不能讲成两张皮。而且联系实际也不一定要对具体问题开处方，可把重点摆在对比体制、政策、社会思潮等的分析方面。这是我们教员的一项强项，讲课时应尽量扬长避短。

还有一点，即国际比较与历史参照。我们今天正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而党校的定位，则又是立足培养治党治国的政治家，作为政治家，毫无疑问得有国际视野。两年前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所以能从容应对，关键就在政府高层有世界眼光。另外，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样教员讲课若能用历史作参照，不仅可鉴古知今，而且会讲得更生动。

最后再顺便说一句。对“研究式教学”大家见仁见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以上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一孔之见不见得对。前面说了，我写这篇文章本来就是想与各位切磋，若哪位同仁另有高论就请赐教，我一定会站起来洗耳恭听。

关于“研究式”考试

但凡做学生的都怕考试，即便有不怕的，恐怕也是凤毛麟角，不会多。当年我读大学功课几乎考“全优”，可若我说不怕考试那是在骗你。三年前参加党校学习，按理不应再怕考试，自己是党校教员，加上考官又都是多年的同事，但真正考起来还是要挑灯夜战，如临大敌。是的，从教十数年，只教不考，早忘了被考的滋味，而那次参考才让我意识到考试对学员有多重要。

党校学员看重考试，是好事，不奇怪。不是说考得好就能提拔，其实大家心知肚明，考试成绩与职务晋升没多大关系。学员所以重视考试，原因有多方面，一言难尽，不过此非本文重点，这里不去谈它。我们要讨论的是，既然学员重视考试，那么党校的考试应该怎么考？考什么？干部教育毕竟不同于学历教育，高校侧重考知识，若把高校的考试搬到党校，张冠李戴肯定不合适。

然而据我所知，党校早年也是考过知识的，比如中青班的入学测试就考过《共产党宣言》哪年发表、康德是哪国人等一类的题目。这类知识性考试，需死记硬背的东西多，考得学员手足无措，怨声载道，说党校像考中学生。我体会，当时所以要那样考，一是为了对学员摸底；同时也是为了给学员一个下马威，让他们多些压力。现在看，那种考试对学员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不合适。

既然学员意见大，入学考试不久即被取消，而毕业考试也一律改为写论文。无需再背书，压力轻了学员当然欢迎，但这却给教员带来两大难题：第一，无从知道论文是否由学员自己写。有的人平时用功不多，可论文却写得好，即便你怀疑他背后有枪手，可无真凭实据照样得给高分；第二，论文选题各不相同，谁分高分低，评判标准不好掌握。通常的情形是，得分低的学员不服气，认为自己论文不差，只是评卷老师不赞成他的观点而已。

平心而论，学员有这种反映也并非空穴来风，类似的情况肯定有。想想也是，评卷教师若不同意作者观点，得高分的希望确实不大。前

些年我在经济学部管教学时，就时常有学员通过我找评卷教师理论。也许是这样的事情太多，后来又回到了考知识，不过不同于以往，是开卷考，无需死记硬背，且考前有串讲，重点也明确。原想这样的考试学员不应该再有意见，哪知考下来还是意见一大堆。

前年寒假前，我参加培训部学员座谈，会上就有学员说，党校的考试太稀松，要求太低，学得好不好都得高分，分不出优劣，考试没啥实际意义。所以学员建议要从严考试。从严考试当然没问题，教务部操作易如反掌，问题是究竟“严”到什么程度合适？那天散会后李书磊副校长把八部一所分管教学的负责人留下来，现场研究，一致的意见是，中青一班写“读书报告”，中青二班采用答辩式考试。

去年实验了两学期，效果应该说不错。让中青一班学员写读书报告，重点当然不光在写，其实是在读。而且阅读书目是由教务部与各教研部（所）共同定，学员得按指定的书目写。作如此规定，一是敦促学员读书，不读书肯定写不出；二是避免别人捉刀。看得出，学员对这种考试很紧张，不是他们不会写读书报告，而是不知考试用的读书报告怎么写。我曾专门就如何写读书报告作说明，可学员的压力仍不小。

相比起来，我认为中青二班考试的压力要更大些。答辩考试在党校史无前例，对学员来说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共20道题，学员现场抽签，现场答辩，三个教员考一个学员，难度可想而知。当时正值学员毕业前夕，按往常的经验，大家免不了会有些应酬，可那些日子谁也不肯外出，每到夜晚，中青二班宿舍是灯火通明，好一派繁忙之景。考完后有学员说，答辩考试要读的书太多了，苦是苦一点，不过收获还挺大。

回头看，这次考试改革虽算成功，但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中青一班写读书报告，初衷原本是让学员读书，避免别人代笔，但事实上，读书报告仍可由他人写，而且评卷教员也发现不了。再比如中青二班的答辩考试，题多面广，让学员抽签答题，这样尽管学员下的

功夫大，需准备的资料达几十万字之多。可这些多数皆面面俱到，很难对某问题作深入研究，也很难出创新性的理论成果。

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党校的考试到底该怎样考。想来想去，我觉得应该突出“研究性”。党校历来强调教员要研究式地教；学员要研究式地学，那么理所当然，考试也得研究式地考。有两个要点：第一，考题要以问题为导向，学员可写论文，也可写研究报告，但需有独立见解，不能只是归纳别人的观点，人云亦云；第二，不论写论文还是写研究报告，一律要通过答辩。答辩不仅可将研究引向深入，而且可看出论文是否是学员自己的成果。

从本学期开始，中青一班考试增加了答辩环节，刚刚布置下去，学员会怎样看尚未可知；另外，中青二班考试是否改为写论文，也需要再研究。总之，增强考试的“研究性”，方向不应该错，至于具体怎么考，可以试错，摸着石头过河，不妨先走一步看一步吧！

论“末位调整”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物种进化的规律，据说达尔文的这一发现，是受到了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竞争法则——“优胜劣汰”的启发。是真是假不肯定，我没考证过。但学经济出身，相信竞争能激发活力是真的。早年在经济学部管教学时，就曾做过竞争上岗的尝试，结果立竿见影：不仅教学效果有明显改观，而且一批年轻教员也因此脱颖而出。

不管你信不信，若一般地讨论竞争，党校教员反对的不会多。大千世界，竞争其实无处不在。当年我们参加高考上大学，是竞争；毕业后进党校任教，得竞争；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是竞争；评教学、科研先进奖也是竞争。大浪淘沙，今天我们能站上党校讲坛，可说都是以往竞争的优胜者，受益于竞争，大家怎会调转头来排斥竞争呢？至少反对竞争的理由是摆不上桌面的。

竞争不会有人公开反对，但联系到具体的人与事，人们却未必能坦然面对。关键在于，要竞争，就免不了有优胜劣汰。胜者当然好说，问题在劣汰，一旦被淘汰，摊到谁头上也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要专作此文说说“末位调整”。所谓调整者，即换人也。可有人问，末位换人不就是末位淘汰么？表面看是，但实则不是。换人是换人，换人不等于淘汰，两字之差，含义却大有分别。

说我的思考吧。年初，校委决定要在培训类班次引入竞争，并让教务部起草操作办法。中心意思是，对讲课最差的教员要停课。临难受命，说实话，最初我想到的也是“末位淘汰”。但与同事商量，皆认为“淘汰”不妥，而想深一层，停课也的确不是淘汰。停课教员身份不变，工资照给，这怎算“淘汰”呢？后来有同事建议用“调整”，我认为贴切。因为调整与淘汰不同，调整只暂时下岗，非长期退出，经过准备将来还可上岗。

是的，调整确实不是淘汰。但尽管如此，调整也总有人要被停课。要追问的是，既然会有人下岗，校委为何还要这么做？其实，我体会

这是不得已的办法。想想吧，目今干部培训已呈多头竞争格局，不仅有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的参与，而且一大批高校也纷纷跟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兵临城下，若不再拿出点过硬的措施，党校怎能立于不败之地？不久前推行的干部自主选学风生水起，竞争空前，校委当然不会等闲视之。

再看党校教学状况。我参加过几次学员座谈，据反映，现在党校课堂讲课非常好的教员三分之一；讲得比较好的三分之一；而讲课比较差的也有三分之一。这是说，学员对目前党校多数课是肯定的，仅少数课学员不认可。可麻烦就在这里，最近教务部对近三年的教学数据作过分析，发现讲课差的基本是同一批人，若这少数人不改进，势必会拖党校的后腿。问题是对这三分之一较差的课怎么办？思前想后，除了末位调整，我想不出有更好的办法。

从经济学角度看，实行末位调整，再一个理由就是教员讲课有“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是说某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积极影响为正外部性；消极影响为负外部性。说过多次，党校学员是个特殊群体，皆为官一方，并掌有一定的决策权。教员课讲得好，学员受益则可造福社会；相反若讲得不好，耽误学员时间不说，要是产生误导，后果还会贻害百姓。

由此可见，校委推行末位调整是势在必行。既然如此，那么我们面对的问题就不是要不要调整，而是如何分优劣。这里的关键，是谁来当裁判。就像篮球比赛，没有裁判就难分胜负。同理，评价教员的讲课效果也要有裁判，而现在的裁判，就是学员，即由学员给教员讲课打分。这个办法已在党校用了多年，效果应该说不错，但也有人对此有微词。比如有学员对教员给低分是因为不赞成某个观点，而教员的观点未必错。实事求是地讲，这种情况是有的，但这也却无碍大局。要知道，教务部在统计学员评分时，不仅去掉了百分之十的最高分，也去掉了百分之十的最低分，经过处理，评分整体还是客观的。

这样讲，并不是说现在的评分办法不需改进，作为管理者，当然知道要改进的地方不少。何况我做教员出身，这些年学员一直在为我

打分；而我也做过学员，也为其他教员打分过。凭我的观察，学员评分虽有偏差，但不管怎么说，打分最高的课绝不会差；而学员普遍给低分的也绝不会好。正是基于此，所以我断定末位调整不会伤及无辜。事实上，让最低分暂时停课，让讲课好的教员多上课，这不过是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国内早就有高校这么做。别人能做到，作为党校教员我们总不该拒绝吧！

行文至此，还有个观点要回应一下。有人说，党校要后继有人，必须给年轻教员机会练兵，若讲不好就停课，年轻教员怎么成长？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不错，年轻教员是要练兵，但练兵不一定非在课堂不可。年轻教员既可在教研部内部练兵，比如集体备课、集体试讲；也可请校外专家开门备课与试讲。这方面，校内不少教研部有很好的经验，榜样就在身边，我们何不仿而效之？若把教员练兵作为反对末位调整的借口，实在是不能让人信服。

